

ZHONGRI
WENSHI
JIAOLIU LUNJI

中日
文史

交流
论集

佐藤保先生古稀纪念

上海辞书出版社

ZHONGRI
WENSHI
JIAOLIU LUNJI

中日文史

交流论集

佐藤保先生古稀纪念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文史交流论集:佐藤保先生古稀纪念/佐藤保先生古稀纪念
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9

ISBN 7-5326-1838-2

I. 中... II. 佐... III. 文化交流—中日关系—纪念文集
IV. G1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5414 号

责任编辑 费芝华

装帧设计 杨钟玮

中日文史交流论集

佐藤保先生古稀纪念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插页 1 字数 180 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1838-2/K·293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55043115

目 录

近代日中文化交流的黎明期

——其调查、研究概况综述 佐藤保 郭万平译(1)

《唐大和上东征传》高山寺本题解并校录 王 勇(13)

一位日本武士眼中的中国

——上田休的中国旅行记 陈 捷(53)

《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

——从引文看两者的政治性 张龙妹(86)

赖山阳《日本乐府》西传考 蔡 毅(98)

《琉球三策》作者考

——再论黄遵宪的日本观及他与李鸿章、

何如璋的关系 李 庆(118)

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 王宝平(130)

宫泽贤治的透明轨道 王 敏(144)

阿瑟·韦利的中日文学翻译试论 张伟雄(160)

清末浙江留日学生的人数、生源组成及专业分布 吕顺长(173)

民国前期留日学生中的女性 周一川(193)

佐藤保先生简历 潘洵译(217)

作者简介	(225)
后记	(231)

近代日中文化交流的黎明期

——其调查、研究概况综述

佐藤保 郭万平译

本文是在1999年8月1—2日于中国杭州市召开的、由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清朝中日文化交流”上所作的学术报告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当时题目为《何如璋在日本》，但报告内容未完全局限于何如璋在日本时期的事迹，也阐述了他如璋来日前后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概况。此次修订，根据实际内容修改了题目。

引言

光绪三年（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以首任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驻日清朝全权公使）何如璋为代表的清朝外交使团来日。他们来日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建立日清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但同时在重新认识、发现日本历史风俗和各种制度、搜集残存日本的汉籍、与日本人汉文唱和等学术文化交流方面，也具有意义。

有关此次清朝外交团来日的意义和影响，自193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在中日近代史、外交史、国际关系论、文化交流史等领域作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①。其中，中国学者王芸生从中日外交史角度进行的研究《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②，以及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从文化交流层面所作的一系列调查、研究^③，均为开拓性同时也是最基础的调查和研究。此外，木下彪《明治诗话》（东京，文

中堂,1943年9月)详述明治初期日本汉诗界状况,其中叙述清朝外交官与日本汉诗人的交流部分,成为其后藉诗文研究两国文化交流的滥觞^④。战后尤其在近年,学者们对清末、明治初期日清两国的交流、交涉的研究兴趣明显增强,研究人数不断增加,调查研究逐步深化,研究对象也扩至驻日清朝公使馆人员的个案,除了较早对参赞黄遵宪的研究之外,近期关于公使何如璋、馆员杨守敬等人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展,取得了新成果。

本文在回顾这些调查研究成果的同时,有关日中两国正式建交之前的文化交流,以及以何如璋为代表的首批驻日清朝公使馆人员,在清末即明治初期日中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笔者略陈管见。

一、前史——日中建交之前的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状况

清朝末期的中国以及刚从江户时代末期过渡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两者均奉行锁国政策,均为近代亚洲的落后国家,两国有识之士均把目光投向业已实现近代化的欧美列强。众所周知,两国政府的外交交涉,起初均勉勉强强,在列强要求开国的重压之下,开始了不平等外交。当时两国无论如何首先要消除列强的侵略、威胁,以保家卫国的富国强兵之策为当务之急。在此情况下,日中两国在建交之前,虽为邻国,事实上却没有任何官方交往,属于“虽近实远”的关系。

然而,在尚未确立外交关系之前的两国关系中,日清文化交流活动事实上已经开始启动。在向欧美列强学习的过程中,从江户时代末期到明治初期,两国主要是以日本通过清朝这一窗口吸收欧美政治、学术文化的方式而开始交往的。

(1) 西学(洋学)研究

通过梁启超《西学书目表》^⑤(1896年)等书可知,从明代到清朝

末期,曾有大量西方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该书把1896年之前在中国刊行的汉译西学书籍著录于“本表”中,“算学”以下“无可归类之书”(不能分类之书)(括号内由增田涉翻译。以下同)分类为三编二十八类。除此之外,也附录“通商以前之西书”(通商以前的西人译著)、“未刻书”(近译未印书)、“中国人言西学之书”(中国人著书)。关于《西学书目表》,增田涉《中国文学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7月)有详细的书志介绍,在书志介绍中也涉及到若干《西学书目表》著录书籍在日本的传播、影响等情况。但遗憾的是,诚如增田所指出的那样,《西学书目表》缺少有关各书的成书和出版等信息。不过,依据各位译者的传记,大致可以推测成书和出版时间。

至于这些汉译西学著作和中国人有关欧美诸国的著作在幕末传入日本的情况,大庭修《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3月)略有论及。中山久四郎《维新前后近世支那对日本的各种影响》(载史学会编《明治维新史研究》,1929年11月)一文,对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载部分汉译西学著作和中国人撰西学著作在日本的翻刻状况进行了调查,这是最早的论文。中山的论文与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并无直接关联,中山的调查也很难说是搜罗无遗,但这种调查研究可以说是基于独立见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日本从近世支那接受过来的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确实十分广泛,从学术、政法、物产、工艺、衣食住、风俗习惯到武艺、军事——号称武国的日本却从号称文国的中国学习武艺军事,这看起来几乎是意外,然而却是事实——采用近世中国为我所用,并有益于日本文化发展,对明治维新之后文化的发展也有所贡献^⑥。此外,中山氏在撰写论文前,曾发表长篇论文《近世支那对日本文化的影响》^⑦。

载于《西学东渐与中国内情——〈杂书〉札记》(东京,岩波书店,

1979年2月)增田涉的《日中文化关系史的一侧面》^⑧一文,是增田氏在中山氏《维新前后近世支那对日本的各种影响》的启发下,经过多年搜集、调查,从浩如烟海的汉译西学书籍和中国人所撰西学关系资料中,选取在日本翻刻、出版的书籍为研究对象而撰写的珍贵书志记录。因为最初以札记形式连载于小册子《书评》上,尚称不上系统的研究论文,况且因作者猝然去世而辍笔,利用书籍种类也不多。但通过详细调查汉译西学书籍、中国人的西学书籍以及这些书籍的和刻本、抄写本的流传情况,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人是如何热情地透过中国而吸收众多的新知识。

因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和禁书令,缺乏与西学的直接交流的机会,近代以前日本人对西学的摄取,不得不依赖汉译书籍、西学书籍,从中国传来的书籍无疑为天降甘霖。其中尤为珍贵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该书在幕末时已有多种覆刻本、日译本问世,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重大影响^⑨。

然而,西学向日本的传播,并非完全通过传自中国的西学书籍。在日本,也偶尔出现阅读西方原典、翻译成日文或汉文的情况。最为人们熟知的例子,便是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翻译的荷兰语医学著作《解体新书》(1774年)。特别是从幕末到明治初期,正值幕府政策的转换时期,日本人对西学书籍的翻译和介绍快速增长^⑩。对于日本人的西学译书以及传自中国的书籍的翻刻、抄写,确有必要详细地加以调查研究。例如,若对《国书总目录》中日本书志、书目类进行仔细核对的话,便可进一步了解其发展概略。

(2) 日中相互研究

日中两国在正式建交前,是“虽近实远”的邻国。但对日本人来说,中国决非“遥远”的国度。即便在两国没有正式国交之时,日本人也非常关注中国,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物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他

们不断获取中国方面的信息。毋庸置疑,日中两国的历史、文化、地理联系是由来已久的。

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不断高涨,促进广泛的中国研究的契机,主要是东亚政治形势所致。具体来说,就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长毛贼)运动。以前一直视中国为强国、先进国的日本人的中国观,开始产生变化。例如,以斋藤竹堂(馨)《鸦片始末》(1843年)、坂原雄《阿片乱记》(1845年)为代表,出现了“在幕末诸家著书、论说、意见书中,论及鸦片战争的内容不胜枚举”(前引文《维新前后近世支那对日本的各种影响》)的状况,对于发觉中国(当时的清朝)异乎寻常的懦弱和同样面临欧美列强威胁的日本人来说,把中国的混乱和苦恼作为他山之石,不得不瞩目中国同欧美列强的关系。同时,日本人追随欧美列强之后,觊觎中国的野心也开始萌芽。例如,文久二年(1862年)表面上以通商为目的而被派往清朝的幕府贸易船——千岁丸,同时也以搜集中国及欧美列强的情报为目的。佐藤三郎在《关于文久二年幕府贸易船千岁丸的上海派遣》^①一文中,曾论及“幕末中国观的变化”和“藩士的中国内情调查及其中国观”,当时日本人在调查研究中国之外,也通过中国情势,来了解欧美列强侵入亚洲大陆的实态和真正实力。以林子平《海国兵谈》(1791年)为首,幕末有许多有关中国研究的论著^②。

另外在中国,有关日中建交前的日本研究,有中华日本学会、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合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③)也有佐藤三郎《明治时代前期中国人的日本研究书籍》^④专论。最近出版的武安隆、熊达云《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东京,六兴出版。《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之12。1989年8月),是有关中国人的日本研究的通史性、综合性研究论著,其中第三章“清代的日本研究”精辟地论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状况。该书中提到的独

特的日本研究书翁广平的《吾妻镜补》，最近也在京都朋友书店影印复刻出版（1997年10月），同时附录有编者王宝平所作有关原作者以及书志、研究状况的详细解题。

从时间上来说稍早的翁广平《吾妻镜补》姑且不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日本研究的高涨，是当时政治状况的真实反映。困于倭寇问题的明末以来，中国人对此前几乎熟视无睹的邻国事情的关心空前高涨：首先表现在他们把朝向海外的目光也聚焦于日本；其次因中日同属汉字文化圈，日本也历史性地被视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一员；三是在开港后，有向坚决实施明治维新的日本学习的目的。

从时间顺序来看，日中两国的相互研究，主要以幕末之前日本通过中国吸收欧美的信息和近代化理念；维新后，中国则通过日本学习欧美的近代化实践经验。但面对同样的西欧的先进知识、事例，近代化理念、方法，在日本和中国却未必相同。譬如说，深植于两国相互理解的文明观、对文化的态度，在依田嘉家《增补日中两国近代化的比较研究序说》（东京，龙溪书舍，1986年9月^⑤）等专论中有详细探讨。

二、派遣首次驻日公使团的意义

在上述情况下，以何如璋为代表的首次驻日清朝公使团被派往日本。关于此次派遣的内情以及公使团的目的、成果等，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开始，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和介绍材料，笔者亦曾撰短文^⑥。尽管目前没有新的内容，但不论是非官方的、主要是私人联系，或欧美人作中介的日中两国间的交涉和交流，还是作为官方的，直接坐在同一桌子上会谈，无疑都是日中关系的一大转变。对于首批公使团在外交上的成就，未必全是肯定的评价；但随着国交开始而使两国人们可以自由交流，从文化交流层面来看，这一点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

公使团来日的意义,首先要从与政治经济相关的外交层面,同时也必须从文化交流层面来探讨。

(1) 政治经济、外交上的意义

对于不熟悉外交史、国际关系论的笔者来说,无力充分介绍这些调查研究的情况。但根据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或者最近日中外交史方面的专著,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研究》(东京,严南堂,1995年7月)的记述,以及同书附录《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关系文献目录》等,有助于我们理解公使团的活动。对于身处绝非容易的政治状况中,为了维护国家权益、依然苦心惨淡经营的以何如璋为代表的公使馆员们所作的种种努力,在俞政著《何如璋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吕万和著《明治维新与中国》等著作中有详细论述,流露出对首批外交使节的尊敬和同情。

(2) 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

公使团在日中文化交流中的功绩确实很大。与始终处于劣势的残酷的外交活动相比,在文化交流方面,公使团成员作为传播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师而受人爱戴,备受礼遇之事,可参见实藤惠秀《近代日中文化论》、《明治日支文化交涉》、《大河内文书》等书,最近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日文化交流》阐述尤详。

清朝公使馆员们能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编纂日本文人的汉文著述,撰写序跋,润色和批评汉诗文,参加酒会,积极公布自己的作品,同时也通过日本人获得日本的各种制度、风俗习惯、日本内情等情报,可以说是 give 和 take 的关系。主要成果有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还有继何如璋之后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随从姚文栋的《琉球地理志》、《日本地理兵要》等。

杨守敬、黎庶昌搜集中国亡佚书籍《古逸丛书》，也可视为日中文化交流的重大成就之一。作为书法家的杨守敬，对日本书法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最近在《书论》第26号（1990年5月）出版了杨守敬专辑。据新闻报道，在其家乡发现了大量他在日本期间搜集的日本古文书，关于他在日本足迹的发掘调查，也不断取得进展^⑦。总之，清朝公使团起到了外交使节、文化使节的双重作用。

三、何如璋与日本文人、学者的交流

何如璋作为公使馆的代表，是外交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人物，因繁忙的公务和作为国家代表的特殊身分，他与日本文人、学者的交流自有限度。像参加诗文会之类文化交流方面的应酬，大多委托馆员办理，这一点在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俞政著《何如璋传》中有详论。

尽管如此，何如璋往往忙里偷闲，与众多日本人交往，这可以在当时日本人的著述、遗文中发现一鳞半爪。他与日本人如宫岛诚一郎、中村正直的深交，以及他和日本人交流的片段，在拙文《何如璋与日本——和日本文人的交往》^⑧中也有介绍。

不过，俞政著《何如璋传》是以何如璋在驻日公使馆期间政治外交活动为中心展开论述的，对文化交流方面的记述较少，而实藤惠秀的著述、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则比较详细。此外，张伟雄著《文人外交官的明治日本》（东京，柏书房，1999年4月^⑨）以何如璋、黄遵宪为中心，详细论述了外交活动和文化交流两个方面。

结语

以何如璋为中心的首批驻日清朝公使团的日中文化交流的事迹，从此以后无疑会逐步深化，因为在日本，尚有不少缺乏整理、被束

之高阁的资料。例如,收藏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宫岛诚一郎文书^③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宫岛与公使馆人员的笔谈资料,被利用过的资料只占少数,必须进行全面整理和细致解读。公使馆官员之外的来日中国人所留下的足迹,或者在明治初期与公使官员交往过的日本人的著述的全面调查,以及与清朝公使团相反、当时赴华的日本人的足迹的调查研究,这些均为以后重要的研究课题。通过这些调查,极有可能发现清朝末期、明治初期日中文化交流中活跃的人们的事迹,还有为数不少的逸诗文。

通过这种调查研究,可以探明日中两国的人们在日中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政治文化作用,应该会更准确地评价他们在有着悠久历史的日中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注释:

① 关于调查研究概况,从山根幸夫等编《增补近代日中关系史入门》(东京,研文出版)的《序说》,石井正敏、川越泰博编《增补改订日中日朝关系研究文献目录》(东京,国书刊行会,1996年8月)等日中关系入门概说书以及关联文献目录等可知。此外,也有许多按照专业方向分类的概说书、文献目录。为了避免烦琐,仅列举常见的、相对距今稍近的上述两书。

②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8卷,三联出版社1982年4月。同书在1932—1934年由天津大公报出版部依次出版1—7卷,但第8卷中断。1958年王氏得到张篷舟的协助,着手修订第1卷,但半途而废。1979年再次修订,同年12月修订版第1卷由北京三联书店发行。第2卷之后陆续在1980—1982年发行。1980年王芸生去世后,张篷舟负责编辑尚未完成的第8卷,1982年4月全8卷出齐。

③ 实藤惠秀(又称 sanetou keisyu)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东京,日华学会,1939年。未见)、《日本文化对支那的影响》(东京,萤雪书院,1940年。未见)、《近代日支文化论》(大东出版社,1941年10月)、《明治日支

文化交涉》(东京,光风社,1943年)、《日本杂事诗》(与丰田穰合著。东京,生活社,1943年7月。其后,改订版收入平凡社出版的东洋文库,1968年3月)、《大河内文书》(作者署名 sanetou keisyu。东京,平凡社,1964年5月)、《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与郑子瑜合著。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以下作者署名均为 sanetou keisyu。东京:kuroshio 出版。1960年初版,1970年增补版)、《近代日种交涉史话》(东京,春秋社,1973年7月)、《中国留学生史谈》(东京,第一书房,1981年)等。

④ 《明治诗话》《卷之下》以后,详细叙述清朝公使馆员以及王韬等人与日本人诗文交流情况。同类研究另见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9月)第八章《瀛洲诗会——中日诗词唱和佳话》,其中有详细介绍,但开山之作,当属木下氏的论著。

⑤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增田涉著《中国文学史研究》所收。

⑥ 中山久四郎:《维新前后近世支那对日本的各种影响》之三《近世日本人通过从近世支那传来的汉籍唐本而得到的西洋新学的见识》。

⑦ 《近世支那对日本文化的势力影响》一文分八次连载于《史学杂志》第25编第2号(1914年2月)至第26编第2号(1915年2月)。该文副标题为《以近世支那为背景的日本文化史》,将学术文化诸领域分为4章19节加以论述,论文主体为第2章“近世支那与本国的学术和政治”,第2章第8节“从汉籍学到的西洋新知识”虽经扩充,但事实上是前引《近世日本人通过从近世支那传来的汉籍唐本而得到的西洋新学的见识》。《史学杂志》所收论文的作者署名中村久四郎,与中山久四郎为同一人。

⑧ 增田氏除了《西学东渐与中国内情——〈杂书〉札记》、《中国文学史研究》外,还有《杂书杂谈》(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3月),内容与上述两书有重复之处,另有许多两书未见的汉译西学书籍,记述了这些书籍在日本的传播情况。

⑨ 参见增田涉:《日中文化关系史一侧面》之5《〈海国图志〉、〈圣武记〉等》之6、《松阴与魏源》。此外,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东京,东方书店,1980年5月)的末章《鸦片战争与〈海国图志〉》、增田涉《杂书杂谈》也有相关记述。此外,在伊原泽周《日本、中国摄取西洋文化论》(东京,汲古书院,1999

年3月)第2章的引言部分,也介绍了幕末志士喜欢读《海国图志》的情况。

⑩ 概况可参照增田氏上述三书。另见吕万和著《明治维新与中国》(东京,六兴出版,1988年10月,《东亚中的日本历史6》)第3章《3 西学传播与明治维新》等。

⑪ 原文最早载于《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7卷第3号(1972年1月),后收入《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3月)。《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中也收录和鸦片战争相关、论述日本鸦片问题的《近代日本的鸦片问题》(原载《日本历史》第129、130号,1959年3、4月)。

⑫ 参照①。另参见吕万和著《明治维新与中国》第2章“中国对明治维新的影响”。

⑬ 同书日文版(中文版?)《中国的日本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4月。

⑭ 《国士馆大学人文学会纪要》第14号,1982年1月。后收录在《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

⑮ 该书初版于1986年9月。增补版《日中两国近代化文化形态后比较》第2章“日中两国对外国文化的摄取”具体阐述了这一问题。

⑯ 《黄遵宪与日本》。载伊藤虎丸等编《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10月)。

⑰ 陈捷有一系列调查研究。例如《杨守敬集》全13册中,第1卷于1988年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发行,几乎用10年时间才出齐,第13卷收录有陈捷整理的杨守敬与森立之笔谈记录——《清客笔谈》。陈捷也调查研究过其他清朝人与日本人的笔谈记录。

⑱ 载《日本中国学会创立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10月)。

⑲ 本书原为笔者1994年向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提出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朝首次驻日公使团——明治十年至十五年外交活动和文化交流中的异质文化理解》,后来整理出版。

⑳ 最近出版的李庆编注《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收录了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与朝鲜人金弘集交往的笔谈记录、黎庶昌与宫岛诚一郎的笔谈记录,注释了29件明治初期至昭和末期日中文化交流方面的珍贵史料。陈捷编《清客笔谈》再次收录其中。

(原载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江户、明治时期的日中文化交流》,
(日)农文协出版社,2000年)